

抗日根据地的正月双拥运动

□ 林 宁

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指出，“为了使党政军民打成一片，以利开展明年的对敌斗争与生产运动，各根据地党委及军政领导机关，应根据地普遍推行减租热潮，党中央引领推动抗日根据地正月双拥运动走向深入，带动全党全军双拥工作大幅提升，对于增强军政军民团结、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创造先行经验，发挥带动作用

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在中央直接领导下，西北局召开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决定，为更加亲密陕甘宁边区军队与地方的关系，由留守兵团发起拥政爱民运动，并向边区政府和各民众团体提议发起拥军运动。留守兵团与陕甘宁边区政府贯彻落实这一决定，共商拟定1943年2月为双拥运动月，利用一个月时间同时集中组织开展拥政爱民与拥军运动。

陕甘宁边区政府定于1月25日至2月25日为拥军运动月。1月16日《解放日报》全文刊发边区政府关于拥军运动月的指示，并在头版发表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署名社论《造成拥军热潮增强拥军工作》，专门指出：“拥军运动月，正是当着阴历新年的时候，这是民间一年一度的欢乐和团聚的时候。这正是各级政府领导人民拥军运动热潮的最好时机。”留守兵团定于2月5日至

3月4日为拥政爱民运动月。2月1日《解放日报》全文刊发留守兵团政治部关于拥政爱民运动月的指示及拥政爱民公约，并在头版发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署名社论《开展拥政爱民运动》。两篇社论相互呼应，全面阐述陕甘宁边区举行双拥运动月的重大意义、目标要求与重点任务。“这两种运动的配合，必然可使边区军民团结大为增进”，形成很强的号召力，推动全边区掀起正月双拥运动热潮。

经过《解放日报》的大力宣传，陕甘宁边区的正月双拥运动形成示范带动效应，引起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广泛关注，一些地区紧跟效仿“双拥公约”“双拥运动月”等新做法。3月华中的新四军政治部公布本军拥政爱民公约，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在全体指战员中进行深入动员和教育。4月晋西北军地双方决定5月为双拥运动月，军区政治部颁发拥政爱民公约，行政公署副主任武新宇专门在《晋绥日报》发表拥军谈话。

5月8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拥军运动和拥政爱民运动的经验》，肯定陕甘宁边区正月双拥运动获得很大成绩，“这次运动不只是形式上的，而是充满着出于心坎的热忱，不只是一般的宣传号召上，而是真正具体的实际的解决了问题”，并总结提炼了其经验做法，称其经验值得供各地参考。在中央政治局作出以后每年正月举行一次双拥群众运动的决定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全面借鉴陕甘宁边区经验及时作出正月双拥运动的部署。

紧抓首要任务，增强团结主动

双拥工作实践证明，严责于己、不责于人是高效处理军政军民关系的正确态度，是增强军政军民团结主动性、黏合性的重要举措。为

此，中央指示要求每年的正月双拥运动应将各根据地曾经发生的部队及党政民的缺点错误，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各方面只批评自己，而不批评对方）而彻底改正之。

1944年元旦，朱德总司令在延安干部新年晚会上作《展开拥政爱民运动》的讲话，为正月双拥运动实行自我批评作出顶层示范。他严肃指出我们军队里面一部分同志忘掉了过去的优良传统，犯了一些军阀主义的毛病，必须改正；军政民关系如搞不好，一般的也要军队负主要责任。

各抗日根据地在正月双拥运动中把实行公开检讨作为首要任务抓紧抓好，着力引导各级干部、战士对标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开展自我批评，尤其是军队方面抓得更加深入。其中晋察冀边区的做法具有典型性。

1943年12月，中央晋察冀分局发出关于执行拥政爱民及拥军政策的指示，总结检查6年以来边区的拥政爱民与拥军工作，指出军队一方有些同志存在不认真执行政府法令、不关怀群众利益等错误缺点，党政民一方有些同志存在优抗工作做得差、对军队困难不积极协助解决等错误缺点。在1944年正月双拥运动中，军地双方组织引导各级干部、战士对标这些方面见人见事进行检查，并在军民联欢会上公开检讨，尤其是战士面向群众做的爱民检讨赢得群众更加用情用心的爱军拥军，军政军民空前团结。

2月8日元宵节，晋察冀边区双拥大会隆重召开，5000余军民参加，军区领导特地总结梳理前期各部检查出来的典型事例，在会上作了诚恳的检讨。在拥政方面，政府反对高利贷，但当老乡青黄不接时，有个部队以不当方式借给他们粮食……在爱民方面，有的部队机关占了老乡的房子……这番检讨深深打动了在场的群众，战士们不断地鼓掌高呼“拥护共产党八路军”“爱护子弟兵帮助子弟兵”等口号。

跟进检查指导，提升工作质效

1944年2月7日是正月十四，中央下发关于检查拥政爱民及拥军优抗工作的指示，一直发到连队与区委，指出各地双拥运动工作中暴露出来的突出共性问题，要求认真对照检查及时改进，抓紧运动时机着力提升质效。

在拥军方面，党政发动群众拥军应多注意切实解决优抗、归队问题，帮助部队解决困难，以及在精神上、政治上对部队多给予亲切的热烈的鼓励，不只在多送东西。在拥政爱民方面，一是部队未充分利用访问群众、纪律检查、损坏赔偿、军民联欢等工作，深入开展干部、战士的思想政治教育，使他们懂得革命军队与旧军队不同的性质和任务。二是部队要注意研究访问调查方法，避免流于形式。除了直接访问群众之外，还要想出一些别的能够了解民情的方法（如通过党政民众团体去了解或各个连队之间相互检查等）。指示还强调，在正月双拥运动过去之后，各地仍须对照此次规定工作内容进行检查，继续深入运动尚未完成的工作，以期彻底改善军民关系与军队内部关系。这也为检查落实正月双拥运动工作同深化推进日常双拥工作有效衔接提供了指引。

各抗日根据地贯彻这一指示精神，在运动期间抓紧检查改进有关工作。晋绥边区行政公署抓紧发出各级政府帮助军队生产的具体指示，对分配给军队土地问题、借用群众工具给军队问题等作出规定。

新四军淮南军区政治部在组织直接访问群众的基础上，召集区一级政民干部作典型讨论，进一步发掘因群众对军队客气而隐瞒利益受损的情况，并根据这些材料赶在运动结束前对各部发出拥政爱民纪律的补充规定15条，受到当地群众称颂。

(上接1版)

辩证处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重大关系

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是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创新思路举措、狠抓工作落实，特别是要辩证处理事关全局的几个重大关系。

战略性和操作性。战略规划是指导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蓝图和行动纲领。既要立足长远科学决策，加强顶层设计，使制定的战略规划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又要求求真务实，加强分层对接，细化操作流程，将战略规划转化为可落地、可检验、可实施的具体方案，让战略规划变得具体可感、易于执行，确保战略规划一步步实现。只讲战略性而不注重操作性，再好的战略规划都会流于形式，成为空中楼阁；只讲具体操作而不讲究战略规划，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甚至南辕北辙、迷失方向。实践中，既要加强战略先导，坚持教育科技人才规划目标取向协同一致、任务举措衔接配套、保障措施同向发力，注重规划整合、资源统筹，增强前进的方向性、引导性；又要加强战术落地，坚持问题导向，注重学科建设、招生就业、科研攻关、科技评价、人才计划、激励奖励等各类政策工具的组合运用和统筹联动，在补短板、强弱项上持续用力，增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精准性、实效性。

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决不是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单项发展，而是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整体推进，强调坚持系统观念，以全面的、联系的而不是以孤立的、片面的观点来看待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注重一体谋划、相得益彰。整体推进，要求我们统筹谋划各个方面、各个要素、各个环节政策举措，加强不同时期、不同领域政策举措配套衔接、良性互动，注重推动各项政策举措系统集成、协同高效。整体推进不是齐头并进、平均用力，重点突破不是倚轻倚重、顾此失彼。必须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为突破口，有力牵引和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既整体推进又突出重点，在提出总体方案、时间表、路线图的同时进一步明确战略重点、优先顺序和主攻方向，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在整体推进中实现重点突破。

发展和安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在发展教育科技人才事业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挑战。比如，在教育方面，面临着西方敌对势力意识形态渗透的图谋；在科技方面，面临着科技“双刃剑”以及美西方国家对我“卡脖子”等风险挑战；在人才方面，面临着国际人才竞争白热化导致人才流失、高端人才引进难等问题。这些风险挑战是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如果防范不及时、应对不力，就会关联辐射、传导扩散、叠加演变，最终影响到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危及国家安全。安全是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和目的。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发展和安全深度融合，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在部署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时，要更多考虑安全因素、寓安全于发展中，在发展中国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既要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来提升安全能力，又要善于塑造有利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安全环境，切实维护教育安全、科技安全、人才安全。

自立自强和对外开放。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始终把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具体来说，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培养道路。坚持自立自强，并不意味着闭关自守、关起门来搞建设，而是要学习借鉴国外优秀文明成果。近年来，美西方国家对我“筑墙”“脱钩”“断供”，对此我们绝不能乱了阵脚，绝不能消极被动，更不能搞自我封闭、自我隔绝。别国越是搞“小院高墙”“脱钩断链”，我们越要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不动摇。需要指出的是，坚持对外开放、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决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照搬照抄，而是去粗取精、辩证扬弃。要把握世界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的共性特征和规律，更加有效利用世界一流创新要素资源，优化教育开放全球布局，着力打造全球科技共同体，深化人才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教育科技人才治理，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

扎实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重点任务

当前，我们正处于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性交汇期，国际上围绕高质量教育、科技制高点和高端人才战略博弈空前激烈，教育科技人才领域的赛道和竞争呈现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我们必须围绕“高质量教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高素质人才”共生赋能的“三高目标”，抓住关键重点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

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推动形成以教育为先导和基石的一体发展格局。重视教育的先导性、基础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把教育作为一体发展的先手棋，前瞻部署、提前布局，以教育的强赋能科技之强、成就人才之强。一是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调整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全面协调、优质均衡发展，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二是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建立人才自主培养与科技自主创新良性互动、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教育结构。三是围绕成为科技创新策源地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优化高校布局，深入推进“双一流”高校和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推动招生育人、科研攻关、人才培养有效贯通，深化教育理念、体系、制度、评价、治理等变革，培育教育发展新动能。

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形成以科技为驱动和牵引的一体发展格局。坚持将科技创新作为“指挥棒”和“红绿灯”，围绕制约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最紧迫最突出的问题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科技创新和发展高质量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有机联动。一是打造体系化、建制化、协同化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二是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突出国家战略需求，部署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注重面向重大科学问题的协同攻关，强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原始创新导向，产出更多标志性原创成果。三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加快构建科技型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上下游企业参与、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联合体。

加快培养高素质人才队伍，推动形成以人才为核心和纽带的一体发展格局。人才发展是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共同任务和内在要求，必须坚持走人才自主培养之路，着力造就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更好支撑教育发展、创新型人才队伍，进一步优化人才结构，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抓紧培养国家发展急需和长远需求的创新型人才。一是坚持高端引领，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打造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造就规模宏大的青年人才队伍，培养大批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术人才。二是完善人才发展治理体系，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评价导向，深化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收入分配改革，畅通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人才交流通道，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形成以新质生产力为主攻方向和着力重点的一体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敏锐捕捉科技前沿动态，打破教育科技人才等要素配置的传统模式，实施创新性优化组合，通过科学配置教育资源，有效提升科技供给、持续优化人才结构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一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根据本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超前布局，构建富有本地特色和优势的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体系。二是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探索技术转移、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一体推进的新模式。三是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创新，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拓展深化应用场景，全方位赋能人才培养和素质提升。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信息资料馆馆长)

邹韬奋：“战而不屈”的文化战士

□ 黎 凌 肖伟光

邹韬奋是我国现代史上卓越的文化战士、伟大的爱国者、杰出的出版家和新闻记者，既是“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同时也是首批国家公祭日公祭烈士名录中唯一的新闻出版界人士。邹韬奋爱祖国、敢斗争，在鲁迅先生葬礼上，他振臂高呼：“许多人不战而屈，鲁迅先生是战而不屈。”“战而不屈”这四个字，正是他一生最生动的写照。

为民立言：以笔为剑守护正义之光。“言论要完全做人民的喉舌，新闻要完全做人民的耳目”，这是邹韬奋创办刊物时定下的初心。他一生共创办并直接主持过《生活》周刊、《大众生活》等五刊一报一书店，他以这些平台为阵地，推动民众思想觉醒。1930年2月22日，上海大光明影院上映的美国电影《不怕死》充斥丑化中国人的镜头，复旦大学教授洪深当场抗议却遭殴打关押。邹韬奋闻讯后，第一时间致电捕房声正抗议。在他的呼吁与上海各界声援下，老闸捕房3小时后便释放洪深。次日清晨，邹韬奋带领同事登门慰问这位素不相识的勇者，并在3月9日出版的《生活》周刊刊发《大光明中不大光明》一文，以犀利笔触痛斥相关方面“简直是十全奴性的十足表现，卑鄙龌龊寡廉鲜耻到了极点”，用文字捍卫民族尊严与民众情感。

1931年，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王伯群耗费巨资建豪宅、迎娶女学生的行径被读者举报至《生活》周刊。邹韬奋见信后当即刊发读者来信。面对王伯群的狡辩，他一面公开读者来信以正视听，一面派记者深入调查，最终查实王伯群利用职务之便的贪污真相。王伯群随即派说客携带十万元对邹韬奋进行贿赂，被邹严词拒绝；面对匿名“警

告”，他依旧无所畏惧，坚持刊登调查结果，并直言“苟有亏心之事，必有拆穿之日，终必为社会所唾弃”。这份不为名利、不惧强权的坚守，正是他为人民利益而斗争的鲜明写照，也让《生活》周刊成为民众信赖的正义阵地。

扎根群众：聚民之力筑牢斗争根基。邹韬奋始终坚信，人民群众是斗争的主力军，他的一生始终践行“贴近大众、依靠大众”的理念，从群众中汲取力量，并将民众力量凝聚成抗日救亡的磅礴洪流。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政府奉行“不抵抗主义”，而马占山率领东北边防军誓死抵抗，他在通电中指出：“大难当前国将不国，惟有淬砺所部，誓死力抗，一切牺牲，在所不惜。”邹韬奋深受感召，在《生活》周刊上发起全国性捐款支援活动，社会各界纷纷响应。短短一个月内，《生活》周刊便收到捐款十二万零二十元。捐款者络绎不绝，就连孩童也挤在人群中慷慨解囊，一位“粤东女子”更是将二万五千元遗产委托邹韬奋转赠抗敌部队，卖菜小贩、挑担村夫也主动递上辛苦挣来的角子和大洋，群众的赤诚之心，成为抗战斗争最坚实的后盾。

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生活》周刊日夜赶制增刊，全力唤起民众共赴国难。眼见十九路军伤兵从前线大批撤退，医院严重不足，邹韬奋当即决定开办“生活伤兵医院”救护英勇将士。招聘启事一经刊登，有志青年踊跃报考。3月4日，“生活伤兵医院”正式开业，这一善举得到了读者们的热情支持，更让前线浴血奋战的十九路军将士深受鼓舞、倍感温暖。从发起捐款到创办伤兵医院，邹韬奋始终扎根群众、依靠群众，既凝聚了斗争力量，更彰显了群众中蕴藏的无穷智

慧与爱国热忱。

智斗明辨：以策为刃提升斗争效能。在长期的斗争中，邹韬奋注重策略方法，灵活应对，以取得最大的斗争效果。在舆论宣传斗争中，邹韬奋采取“以大众喜闻乐见为抓手、以抗日救国为主线”的策略，让进步思想广泛传播。《生活》周刊在1931年发行量达到15.5万份，在宣传反蒋抗日中起着特殊的作用。毛泽东高度评价邹韬奋：“我们干革命有两支队伍，武的是八路军，文的是邹韬奋在上海办刊物、开书店。”

由于刊物的影响力持续攀升，反动势力不断地对邹韬奋威逼利诱，他则采取立场坚定不妥协、应对灵活有章法的斗争策略，一次次化解危机。1932年1月，胡宗南奉蒋介石之命召见邹韬奋，要求《生活》周刊改变立场拥护国民党政府。面对威逼，邹韬奋没有硬顶硬抗，而是以“聚焦抗日核心”为突破点，坚定表明立场：“只要政府公开抗日，我们便一定拥护，在政府没有公开抗日之前，我们便没有办法拥护。”他与胡宗南激烈辩论4小时，始终紧扣“抗日”这一全民共识的核心，让对方无懈可击，最终胡宗南无可奈何，只能僵硬别告诫“请先生好自为之”。

由于《大众生活》积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揭露国民党当局分裂倒退行径，引发国民党忌恨。特务头目刘健群、张道藩借土匪人部洵美之邀与邹韬奋深夜会面，张道藩空谈3小时企图拉拢，刘健群则抛出法西斯谬论并赤裸裸威胁：杀一个邹韬奋，绝无问题。面对软硬兼施，“生死早置度外”的邹韬奋坚决回绝，直至次日凌晨仍让对方无计可施。不久，青帮头子杜月笙提出奉命“陪送”他赴南京见蒋介

石，承诺保障安全，邹韬奋深知其中有诈，没有贸然拒绝，而是先与救国会同仁商议，再果断回绝，既避免了单独应对的风险，又坚守了立场，让杜月笙无奈而归，也让赴南京接站的戴笠空手一场。

初心如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44年6月，邹韬奋因罹患癌症时常陷入昏迷，偶有一天神志清醒，他对夫人沈粹缜如是说：“过去在重庆，我已不止一次地告诉过你，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人民的救星，我虽然不会使用枪炮作武器，但是我用锋利的笔尖，挑开国民党无耻阴谋的黑幕，号召民族团结起来，反对敌人，那时我还能起着中国共产党政治上助手的作用。我要在敌人的地区内坚持斗争，不愿就此离开。”这份对党的赤诚与对斗争的执着，贯穿他生命的最后时光。

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与世长辞，他在遗嘱中写下遗愿：“请中国共产党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1944年9月28日，中共中央致邹韬奋家属的唁电中明确答复：“接受先生临终的请求，并引此为吾党的光荣。”毛泽东为他题写挽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从为民立言的正义守护者，到扎根群众的力量凝聚者，再到智斗强权的不屈斗士，邹韬奋用一生的奋斗真正践行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